

台灣歷史上的琉球難民遭風案

楊彥杰

福建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19世紀70年代，日本曾借口琉球難民在牡丹社被害事件，悍然出兵台灣，引起一場嚴重的中日糾紛。¹其實，歷史上琉球遭風漂到台灣的事件是經常發生的。而且絕大部分都得到了妥善的救助和撫恤。這是中琉雙方長期海難互助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中琉友好關係的反映。歷史上琉球難民為甚麼會遭漂到台灣？他們在台灣如何得到救助和撫恤？這些問題以往雖然已有人做過探討，但數量還不是很多，而且有很多地方仍有待深入。²本文擬利用大陸和台灣新近出版的檔案資料，結合琉球《歷代寶案》等，對上述問題再做一些簡要的分析 and 討論。

一、清代琉球難民漂往台灣的原因和背景

琉球難民從何時開始漂往台灣？史書上並沒有明確的記載。從明朝初年開始，中琉雙方已建立起朝貢貿易關係，但此時台灣尚未大規模開發，琉球船隻即使有遭風漂至台灣亦沒有甚麼資料保留下來。清朝統一台灣後，兩岸形成一個整體，島內土地的開發也迅速發展，在此情況下，有關琉球船隻漂抵台灣的記載也日增多起來。

第一個琉球船隻漂往台灣的實例出現於康熙五十九年。據琉球《歷代寶案》記載，是年十月有6名琉球人在海上遇風，其中2人餓死，4人在淡水被救助上岸。原檔案云：

難番同船六人，名前間、仲治、字【志】、也德、真座、白間；于歸年（引者按：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在北山永郎部開船往中山採取木料，舟行半海陡遇颶風，帆舵俱失，船已破壞洋中，【餓】死前間一名，其餘飄流亡至台灣淡水地方，又餓死真座一名，更仲治等四人淹淹待斃。幸【遇】淡水番社救活具報，解送來省。³這些獲救的難民後來被送往福州，在那裡受到撫恤安頓後搭船回國。

在朝檔案裡，類似這樣的記載很多。據琉球《歷代寶案》，及北京出版的《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續編》、台灣的《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等，整個清代，從康熙五十九年到光緒二十年，前後175年間共有64起這類事件發生，平均每兩、三年就有1起（詳見附表）。

這些遭風漂到台灣的琉球船隻，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海上從事各種經濟活動而遇難的，尤其是運載貢米、貢物到中山王府交納佔有更大比重。如雍正九年，石垣等48人自太平山開船“進米納貢中山王”，事竣後從那霸返回，途中遇風。⁴乾隆十年，良多間親雲上等40人從麻姑山“因運漕進貢琉球國王”，在洋被風。⁵乾隆十六年，比屋定目指等22人從古米島“駕坐海船一隻，裝載糧米、草席等項前赴中山王府交納”，在洋遇風。⁶乾隆四十四年，石原等25人從久米島“奉本處地方官差令，裝載米石運往中山交納”，遭遇風暴。⁷嘉慶十六年，具志堅等12人自中山省泊村坐駕海船一隻，“差往八重山催納貢米”，在洋遭風漂流等等。⁸

為甚麼這些在洋遭遇風暴的主要是運載貢米、貢物的船隻？這與當時琉球國內的農業生產及土地制度都有密切關係。清代琉球國內仍實行土地分賜制度，所有生產糧食的農田大都成為王府以及達官貴人的采地。每當農耕是時節，“各官分賜采地皆親至其地，視耕視獲；有職官或子弟督之。……十一月下旬，遣加謁者一員、察侍紀官二員分巡各村勸農，月餘始歸。”⁹由於琉球田

土盡歸官有，“米惟國王及諸貴族官家得食，小民皆食番薯。”¹⁰因此，各地生產出來的糧米便都成為必須交納的貢賦而運往中山。

當時琉球的產糧區主要分布在南部諸島，“姑米山、八重山，產米最多。”¹¹此外，還有“太平山(始為官古，後為迷姑，今為麻姑)：在國南二千里。……周圍五、六大里，頗富饒。”每年五月，均與八重山一起“貢稅於中山”。¹²這些地方的船隻要運糧北上，在帆船時代就必須依靠南風才能航行。而夏季往往是颱風盛行季節，琉球“六月中，大颶屢作，海雨橫飛”，¹³不僅嚴重影響著農作物的生長，也威脅著船隻航行安全。我們在檢視琉球船隻在海上遇難的檔案中發現，那些漂往台灣的船隻主要不是出現在夏季，而是較多出現於農曆的三、四月和九、十、十一月間(詳見下表)。很顯然，琉球船隻更多的是利用春夏之交和秋冬時節季風轉換時“候汛”北上的，但如果在海上遇到風向變化，碰到強烈的東北風，就很有可能會隨風而下被刮到台灣島。

清代台灣所遇琉球難船遭風事件按月統計表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不詳	總計
案件數	4	2	7	11	3	2	2	3	8	9	8	4	1	64

琉球船隻被漂往台灣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一點，與當時琉球國內的船隻太小也有一定關係。康熙末年出使琉球的徐葆光在《中山傳信錄》說：琉球船隻除了貢船仿造福州烏船樣式外，“其各島往來通載之船，大小皆尖底，底板鱗次；……小船，皆剝獨木為之，極輕捷；村民、漁戶皆用之。一舟不勝載，則雙使為用。”¹⁴所謂的“小船”實際上是獨木舟，而在各島之間往來的大小尖底船，它會大到何種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實也正是如此。我們在琉球檔案裡發現了一些可具體測算船隻載重量的數據。如嘉慶十五年李喜清等9人自宮古運載“糧米五百四十包、馬一匹”返回那霸，在洋遭風。¹⁵據道光十六年玉城仁屋等人的遭風案，每包米重75斤。¹⁶如果按此推算，這540包糧米總重量為40500斤，倘若加上9個人和1匹馬，並考慮可能還有一些雜物，充其量也不會超過50000斤。也就是說，這隻船的載重量僅為400餘石而已(按1石=120斤折算)。這樣的船隻僅相當於福建沿海一帶的小漁船。¹⁷由於載重量太小，只能適用於琉球國內各島嶼之間的往來，一遇強風就很難抗禦，尤其是被風漂出大洋之後，其危險性就很大。因此之故，我們在清朝檔案裡很難找到漂往台灣的琉球難船還有能被修復繼續使用的，有的已在大海中解體，有的則在靠近海岸時“沖礁擊碎”了。

二、台灣對琉球遭風難民的撫恤

有清一代，凡是有琉球難民漂抵台灣，都會得到當地兵民的救助和撫恤。這些琉球難民不管在哪裡被搶救上岸，首先要由地方官府撫恤安頓，再配船內渡，最後由福州遣送回國。

福州自從明成化以後，一直作為琉球貢船往來、使臣出入的重要口岸，因此也自然成為接受、遣送琉球難民回國的中心。清政府對琉球難民的撫恤有一套具體的政策規定，這些政策從乾隆二年開始就已經形成。簡單說起來，可以分成“恤”和“賞”兩部分。所謂的“恤”是指提供給生活必需品。當難民被送抵福州安插柔遠驛以後，每人每天發給口糧一升、鹽菜銀六厘；回國登船之日，發給行糧一個月，以資長途食用。所謂的“賞”指的是額外給予的部分，以示清政府對琉球難民的憐憫和格外體恤。具體是：每人賞給扣藍布四疋、棉花四斤、煙一斤、麵一斤、茶葉一斤，並酌計人數賞給豬、羊、酒三項(人數較少時人給豬肉四斤、羊肉四斤、酒四斤)。所有動支銀兩均於存公項下報銷。¹⁸至於琉球難民在台灣被搶救上岸時，原則上亦是由地方官府動用存公銀兩予以撫恤安頓。但由於台灣在清朝初年尚處在土地開發階段，地方儲存的公款有限，因此有時亦常需要地方官員捐俸資助。如雍正二年，有一隻琉球難船遭風漂抵八里岔，巡台御史禪濟布聞報告，“隨捐給糧米，共飭該地方官沿途保護，毋致失所”。¹⁹乾隆十年，多良間親雲上等40人漂抵淡水金包裡，隨身所帶被褥俱已漂失，當地官員立即稟明御史“酌動公項各制給鋪蓋一副，並各捐俸厚加賞賚”等等。²⁰

由於琉球難民漂往台灣多在東北風季節，所帶行李又常被漂失，因此台灣地方官員對這些難民的撫恤除了發給口糧之外，還常常需要賞給衣服、棉被、鞋襪等物。有的難民在台患病或者身故，還需地方官員予以處理。乾隆三十七年，當問仁也等110餘人遭風漂抵淡水，當地官員聞訊立即趕往查詢，“捐給糧食”，隨後又有一名水手、一名小孩因患病登岸先後身亡，“均經淡同知驗明掩埋”，並捐資將難民連同行李護送到台灣府“重加賞恤”。²¹ 乾隆五十三年，平良等人遭風漂抵台灣後山，十二月從“生番地方”陸續走出，遇見內地民人帶往營汛轉送鳳山縣，“恤給口糧、衣物”。又護送到台灣府安頓撫恤，“日給口糧，並賞賚銀錢、棉布、鞋襪等項”。²² 嘉慶四年十月，兼個段等人遭風漂抵三貂角海邊，“經該處官兵救護，賞給飯食、錢文、衣服，遞送台灣府安頓館驛；又經賞給番銀、布疋、食物等項”，委派員役配船內渡等。²³ 在清代台灣有關琉球檔案裡，類似這樣的記載很多。有的琉球難民經地方兵民救助，再逐程護送進省，時間長達數月之久。²⁴

琉球難民不管遭風漂抵台灣甚麼地方，在清朝初年，均需護送台灣府城，由鹿耳門搭載民船內渡。清朝統一台灣以後，為了加強對該島的管理，僅開放鹿耳門一口與廈門對渡。乾隆四十九年又增開鹿港與蚶江對渡，乾隆五十三年再開放八里岔與五虎門對渡，嘉慶十五年始允准三口一律通行，“不拘對渡”，船隻可以較自由往來。²⁵ 然而，我們發現直至嘉慶二十年以前，凡是台灣所遇的琉球難民，不管在甚麼地方均要護送到台南由鹿耳門配運，而沒有從鹿港或八里岔配船內渡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此時台南與廈門的帆船貿易還很活躍，乾隆至嘉慶初年，“廈門商船對渡台灣鹿耳門各來千餘號”；²⁶ 而且當時台灣的政治中心亦仍在台南，因此從那裡配船內渡較為安全可靠。

但是，嘉慶二十年以後就開始出現由各口通行配船運載難民的情況了。具體地說，在南部救助的難民主要仍由鹿耳門配運，而在北部救助的難民，除了個別由鹿港之外，其餘絕大部分都在八里岔等北部港口配船搭載。嘉慶中葉乃至道光以後，台灣北部的帆船貿易正日趨活躍，而南部鹿耳門、中部鹿港則在急劇衰退之中。²⁷ 因此，配運港口的變化實際上也是台灣經濟重心轉移的一種反映。然而，這時期琉球難民的配船內渡仍有三點需作說明：

- 1、由於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響，清代台灣所遇琉球難民大多漂抵北部，因此這時期從北部八里岔及淡水、基隆等港口配運的實例特別多，反而南部是較次要的。這一點與嘉慶二十年以前有很大不同。

- 2、儘管大部分難民均從北部配船內渡，但在咸豐初年以前，這些船隻大都在蚶江靠岸而沒有直航福州。如嘉慶二十年馬瑞慶山案、二十二年志理真案、二十五年金城案、道光十六年玉城仁屋案以及咸豐元年永東齊案、喜久里案、宮平案等等，均是如此。²⁸ 這反映當時以泉州地區為中心的帆船貿易仍很活躍。但自咸豐七年以後，由於福建沿海地區地區爆發的小刀會——林俊起義尚未平息，交通受阻，此後搭載琉球難民的船隻就沒有航向閩南而改為直航福州了。

- 3、進入光緒年間以後，兩岸已經有了輪船往來，特別是福建船政局製造的官輪經常航行於台北、福州之間，從台灣護送難民內渡便開始改為搭乘輪船，而且直接進省，其移送速度比過去又大大提高了。

三、結語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清代台灣對琉球難民的撫恤是不斷改進和發展的，這是中琉長期友好關係的組成部分。在清朝統治的二百餘年間，目前尚能找到64起琉球難民遭風漂往台灣的案例，這些難民不管在甚麼地方都得到當地民眾（包括原住民）和官府很好的幫助和撫恤，使他們最終能安全返回故土。儘管也有極個別的例子由於難民被漂到後山而遭到“生番”殺害，但這絕不是主流，只要公允、全面地研究所有案例都可以得到這個結論。日本人借口“牡丹社事件”悍然出兵台灣，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此外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就在日本侵台事件發生以後，中琉之間的朝貢貿易也人為地遭到阻斷，但漂往台灣的琉球難民仍然得到一如既往的救助和撫恤，直至光緒二十年即日本割佔台灣前夕才停止。歷史上台灣對琉球難民的救助和撫恤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為延續和發展中琉友好關係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本文是1998年11月11日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的演講稿。

- 1 參見楊彥杰〈沈葆楨與台灣海防〉，載氏著《台灣歷史與文化》，海峽文藝出版社，1995年出版。
- 2 參見吳幅員〈清代台灣所遇琉球遭風難民事件〉，載《東方雜誌》復刊第13卷，第9、10期，1980年3-4月。徐玉虎〈清乾隆朝琉球難夷風漂至台灣案件之輯釋〉，在《台北文獻》直字號，61、62號，1983年3月。
- 3 《琉球歷代寶案選錄》(以下簡稱《寶案》)，第156頁。台灣開明書店，1975年出版。
- 4 《寶案》，第165頁。
- 5 《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以下簡稱《選編》)，第14頁。
- 6 《寶案》，第183頁。
- 7 《選編》，第196頁。
- 8 《寶案》，第296頁；《選編》，第446頁。
- 9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卷五，土田。
- 10 周煌《琉球國志略》，卷十四，物產。
- 11 同上。
- 12 周煌《琉球國志略》，卷四，輿地。疆域。
- 13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卷五，土田。
- 14 徐葆光，上引書，卷六，舟。
- 15 《寶案》，第291頁；《選編》，第415頁。
- 16 《寶案》，第368-369頁；《選編》，第754-755頁。
- 17 參見陳國棟〈清代中葉(約1780-1860)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帆船貿易〉，載《台灣史研究》，第1卷第1期，1994年6月，台北。
- 18 參見《寶案》，第174、178頁。
- 19 《雍正朱批折選輯》，第186-187頁。
- 20 《選編》，第15頁。
- 21 《寶案》，第195-196頁。
- 22 《寶案》，第244頁。
- 23 《寶案》，第247頁。
- 24 如道光二十九年山長元案，前後長達4個多月。參見《寶案》，第387-388頁。
- 25 《台案匯錄丙集》(台灣文獻叢刊本)，第二冊，第283頁。
- 26 道光《廈門志》，卷五，船政略。商船。
- 27 參見陳國棟，上引書。
- 28 詳見《寶案》，第320、328、369、392、393頁，及《選編》，第536-537頁。

【附錄】

清代台灣所遇琉球遭風難民事件一覽表

序號	遭風時間	人名	簡要遭風事件	漂抵地點	出處
1	康熙59.10	仲志等6人	永良部往北山採取木材	淡水金包里	寶155-161
2	雍正2.閏4	下里與等16人	不詳	澎湖西嶼	寶162 硃186-187
3	雍正2.5	宮國目指等25人	不詳	八里岔	寶163-166 硃186-187
4	雍正9.11	石垣等48人	太平山往那霸進米納貢返回	淡水大鼻頭	寶167-172
5	乾隆4.11	田澤實等9人	永良郎往山原運柴生意	三貂角	寶173-176
6	乾隆10.12	多良間親雲上等40人	麻姑山往中山運漕進貢	台灣後山	選14-18
7	乾隆15.2	慶留間等4人	自馬齒山出港捕魚	淡水八尺門	寶177-182
8	乾隆	比屋定目指等22人	古米山往中山王府交納糧米	雞籠山	寶183-186

	16.11		等		
9	乾隆 19.4	半宇望等21人	奉命自中山往大筆山運米谷	淡水奇直港口	宮(9)230-231
10	乾隆 37.8	當間仁也等118人	多良間往宮古島避飢荒返回	淡水南崁港	寶195-201 選147-151
11	乾隆 42.4	向宣烈等34人	受撫恤的難民自福州返回琉球	鳳鼻尾海邊	寶202-207 宮(40)819
12	乾隆 42.4	田福等10人	姑米山差往牡中山王府交納米石等	三貂角洋面	寶202-207 宮(40)819
13	乾隆 44.9	石原等25人	久米島差往中山王府交納糧米	淡水	寶208-212 選195-196
14	乾隆 50.1	向裔富濱等20人	奉命自太平山往多良間載粟交納國王	台灣後山	寶213-217 選205
15	乾隆 50.11	平田等23人	自那霸出海經商	台灣後山	寶218-222
16	乾隆 53.10	平良等16人	太平山往中山王府交納棉布返回	南路生番地方	寶223-226、 230-232
17	乾隆 55.11	古波洋等16人	奉差自那霸往那姑尼運貢米	台灣海邊	寶235-238 選238-239
18	嘉慶 4.10	兼個段等20人	那霸往宮古島貿易	三貂角	寶247-253
19	嘉慶 8.9	馬齒山1人	運米粟往中山王府交納	鳳山縣	寶269-271
20	嘉慶 11.5	柳氏友寄等16人	那霸往北山裝載柴火	雞籠山外洋	選369-370
21	嘉慶 13.3	金城等3人	自絲滿出港釣魚	台灣北路	寶285-289
22	嘉慶 15.3	李喜清等9人	奉差自那霸往宮古島裝載貢米返回	大雞籠深澳	寶290-294 選451
23	嘉慶 15.10	建西表等42人	麻姑山往琉球國公幹返回	南路四浮鑾	寶297-306 選451-453
24	嘉慶 16.閏3	具志堅等12人	泊村差往八重山催納貢米	淡水	寶295-296 選446
25	嘉慶 18.4	樂永儀等9人	那霸差往八重山運米	台灣芝罘里	寶307-310 選459-460
26	嘉慶 18.4	伊良波等3人	在馬齒山放釣	台灣金雞貂	寶307-314 選459-460
27	嘉慶 19.3	宮城等7人	那霸差往八重山催納米石	鳳山番社	寶311-314t 選464-465
28	嘉慶 20.4	安里等14人	芭蕉島差往八重山裝載糧米	鳳山打鼓	寶315-318 選482-483
29	嘉慶 20.4	馬瑞慶山等19人	那霸差往宮古島催收粟麥返回	烏石港	寶319-322 選481
30	嘉慶 22.10	內間等7人	久高島、鳥島往外島變賣米石	艋舺金包里	寶323-326 選509-510
31	嘉慶 24.8	志理真等9人	姑米山差往那霸交納小米	雞籠澳	寶327-330 選523-524
32	嘉慶 25.7	金城等8人	邊戶村差往那霸交杉木返回	大武崙澳	選536-537
33	道光 5.9	上江洲築登之等30人	奉差自姑米山運米往那霸交納	蘇澳馬賽	寶336-339 選629-630
34	道光 8.9	葉渡山等14人	那霸往名護郡裝載薪米	琅山後	寶347-353 選662-663
35	道光 12.11	比嘉等4人	山北府往那霸賣薪木返回	噶瑪蘭龜山	寶354-356 選718
36	道光 13.1	知念等10人	渡名喜島往那霸賣豬返回	台灣後山	寶357-360 選725-726
37	道光 13.12	真章等5人	八重山差往那霸交納黑繩等返回	噶瑪蘭觸奇犁	寶361-364 選729-730

38	道光16.1	嘉手 史地頭等17人	姑米山往中山王府交納柴木等	南路生番界	寶365-367 選747-748
39	道光16.9	玉城仁屋等36人	久米島往中山王府交納糧米火柴	台灣後山	寶368-371 選754-755
40	道光18.1	大城築登之等5人	久米島差往那霸交納米、角木等	琅 大秀房莊	寶372-373 選771-772
41	道光18.3	鄭氏山口等14人	奉差自那霸往八重山催運糧米	鳳山東港	寶373-375
42	道光20.4	平氏友寄等9人	奉差自那霸往宮古島催運糧米	打鼓汛岐洋面	寶376-377 選815-816
43	道光20.11	平姓大城築登之親雲上等26人	奉差自那霸往喜界島催運糧米返回	傀儡番界	寶378-381
44	道光24.4	具志堅築登之親雲上等7人	泊村往本部郡貿易，遇風返回	噶瑪蘭	寶382-385 選862-863
45	道光29.9	山長元等41人	八重山往中山王府交納布疋返回	噶瑪蘭	寶386-390 選908-909
46	咸豐1.11	永東齊等12人	久米山差往那霸交納糧米	雞籠	寶391-392
47	咸豐1.12	喜久里等29人	久米山往那霸交納貢米返回	八尺門外洋	寶392-393
48	咸豐1.12	宮平等14人	渡名喜島往久米山販運米等返回	噶瑪蘭	寶393-396
49	咸豐7.6	新垣等9人	那霸差往八重山催運糧米	三貂洋面	寶401-402 選1001-1002
50	咸豐10.閏3	空沒 哪等8人	多良間差往太平山交納布疋返回	淡水洋面	寶407-408 選1014
51	同治4	比嘉、宇良等9人	不詳	淡水	續1457-1458
52	同治7.7	恭克秀等13人	那霸往宮古島貿易返回	噶瑪蘭	選1062-1063
53	同治8.8	渡嘉敷等2人	那霸往姑米山貿易	台灣北部洋面	選1071
54	同治10.10	松大著等46人	八重山往中山王府交納方物返回	台灣鳳山洋面	選1079-1080 申6-8
55	同治10.10	島袋等69人	太平山往中山王府交納方物返回	琅	選1079-1080 申6-8
56	同治12.4	林廷芳等9人	那霸往太平山交納糧米返回	琅	選1084-1085 申48-49
57	光緒7.2	西銘等4人	南山府往八重山賣糖	台灣縣洋面	申996
58	光緒8.9	久場等8人	那霸往太平山賣鹽茶等物	宜蘭洋面	選1137-1138
59	光緒8.10	向德明等6人	那霸開船往福建	台北洋面	選1135-1136
60	光緒11.5	陳文選等11人	受撫恤的難民自福州返回琉球	台灣	選1146、1149
61	光緒11.9	鄭邦選等7人	那霸開船往福建	台灣	選1150
62	光緒15.10	馬如衡等9人	從與那原津駕坐船出航	台北三抱莊洋面	選1157-1158
63	光緒17.3	毛德昌等11人	從那霸駕坐海船出航	基隆洋面	選1166-1167
64	光緒20.6	屋良等8人	從北山駕坐海航出航	宜蘭洋面	選1171

註： 1、本表中的人數為該案總人數，非指幸存者人數。

2、出處一欄，數字代表頁碼，有加()的代表第幾輯，漢字為書名簡稱，具體是：

- 寶 —— 《琉球歷代寶案選錄》
- 選 —— 《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
- 續 —— 《清代中琉關係檔案續編》
- 宮 —— 《宮中檔案乾隆朝奏折》
- 硃 —— 《雍正硃批折選輯》
- 申 —— 《清季申報台灣紀事輯錄》

傳統中國都市之模式

李金強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傳統中國都市基本上以政治都市為主，而以軍事控制為條件，¹ 梁任公說：「蓋築為崇墉，以保積聚，以圍寇盜，而商旅亦於是集焉，其後政務漸擴，即以為行政首長所注地，為出令之中樞，故最初之都市，皆政治都市也」。² 可作為進一步說明；³ 不過隨著時間之推移，近古宋代的傳統都市，因生產力之提高，國內市場之開拓，經濟性城市之大量出現，尤其是東南各地；⁴ 然就地方行政區劃上，列為省垣及治所的城市，其重要性仍然是在行政，而並不是在經濟性的。⁵

傳統中國都市的景觀，在工業革命後的西方人士眼目中，是公式、乏味、單調、而不誘人的。⁶ 然而舉國劃一的傳統中國城市，⁷ 從明代士人對北京首善之區的景觀描寫——「…高山長川之環固，平原廣甸之衍迤，泰壇清廟之崇嚴，宮闕樓觀之莊麗、官府居民之鱗次，塵市衢道之基布，朝覲會同之麋至，車來騎逞來之坌集，粲然明雲霞，滃然含煙霧…」⁸ 可推想出傳統中國城市的氣派宏偉壯麗地方上其餘城市也許規模未能匹配，但不竟仍有其形勝，殿樓市列之美姿，特別是首都地區。

就歷史上而言，自古以來中國的都城建設及都市機能區域的配置，是十分有規模的，⁹ 傳統中國的都市，地理學者沙學浚先生提供其型態為「方格式作十字形與四城門相聯」，¹⁰ 就整個都市而言，當中尤以城垣的雄姿矗建最為明顯，而城池之為險要，其功在防衛禦敵。¹¹ 城有一重、兩重或三重，內重通常稱「子城」(或稱牙城，小城)，外重叫「羅城」(有時稱大城)，同時羅城的門外又有弧型壁壘圍住，稱「甕城」。以上各種城之城牆，皆用磚甃，或者土石砌成，而羅城之外，則更有護城河之濠溝圍繞著，而子城每每為皇居，州署縣之所在，子城外羅城內，則為民居，寺院或其它行政官署之所在，¹² 假若鳥瞰地觀察中國的城市，很像是一個「回」字展佈在大地之平面上。

傳統中國都市之機能配置(或土地利用)，除了上述子城、羅城區域的固定機能外，其餘可作如下瞭解：重要及高大的建築群均左右相對地配置於全城空間之中軸線上，¹³ 而城內之街道結構，乃由方形區域的「坊里」直角相交而成，出現了「棋布櫛比，街衢繩直」的現象。¹⁴ 「坊里制」這種傳統中式的機能配置，其建構全是由圍牆限起的區域，除特定高官外，普通民宅不得向大街開門，其機能則為住宅及市肆。同時並有街鼓制度，設有擊鼓，提醒平民得知坊門之日開夜閉。至於「坊里制」之歷史背景，大抵始於周、漢，初稱為「里」，後魏時代，「坊」乃「里」之俗稱，隋代始用「坊」名，煬帝時，改為「里」，至唐代又稱為「坊」俗間也稱「里」，漢唐之里坊大體相同，發展至北宋，城制崩潰而街巷之名，便漸漸地取代里坊了。¹⁵ 「坊里」最能夠表現出傳統中國城市規劃之齊整性。根據勞榦先生的意見，這極可能是西周「井田制度」有一種影響的關係存在。¹⁶

傳統中國都市內一直有界限肯定之商業區域，自漢至唐宋均稱之為「市」。¹⁷ 當時，所有商店均設在市內，同業的商店則集合為「行」，而由「行」聚而為「市」，以進行買賣交易之行為，並且依照「坊制」之開閉而市貿有時，不過，這種制度，到了宋代，隨著坊制的破壞，商店

再沒有了空間時間的限制，可以在城內外臨街地段設置，不問晝夜地營業。¹⁸特別是長江以南的城市發展，在宋代以後，“無限制”的市，隨著貿易發展，大多臨河而建，市開始於濱河之地發展，因而時常出現「河街」，成為一市精華之所在，¹⁹使都會更加繁榮，而「市」向濱河移建，主要是因為河道居交通要衝之故也。

傳統中國都市，磚牆之圍城，肯定了和規範了其城市之生命力，然而隨著封建社會晚期之中國經濟蛻變，農產品之商業化與手工業之興起，促進社會生產力之活躍，負起行政與防衛機能的城牆，終於被「自由貿易」的巨大洪潮沖破了，而使某部份中國傳統城市的建構景觀及機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此即「坊制」與「市制」之破壞，以及其有經濟機能之港市與市鎮之興起，其中尤以明清時期之江南市鎮最具代表。²⁰

及至十九世紀中葉，西力東漸，自鴉片戰爭(1839-1842)後，中國開五口通商沿河沿江地區遂出現通商的新興租界促使中國現代化，²¹中國城市發展景觀面目出現新的蛻變，在西商、西教以及駐外領事等設施於通商口岸為雨後春筍陸續建設後，遂出現了揉合中西文化混合的城市新景觀；在傳統中國舊城之行署、廟宇店舖、民房等建築外，逐漸湧現出一批使館、醫院、教堂、學校、洋行等西式建築，²² R.H. Tawney 形容中國通商口岸城市景觀，有如「鑲飾在舊式長袍四圍的新式花邊」²³無疑至為恰切，而傳統中國城市模式的景觀，至此又出現了新的「革命性」變化！

¹ 嚴耕望：〈中國史上的都市〉，《中國歷史與地理油印講義十》，都市頁1；Lawrence J.C. MA,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Change in Sung China 962-1279* (Michigan Geographical Publication No. 6, 1971), p.9 & p. 49-50.

² 梁啟超：《中國文化史》(台北：中華，民55)，頁62。

³ 趙岡：《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台北：聯經，民84)，頁3-5，10-15；趙氏認為中國早期城市已分為政治軍事機能的「城都」及附有經濟機能的「市鎮」兩大類；然早期城市興起，初以政治及軍事為決定因素。

⁴ Lawrence J.C. MA., op.cit., ch. III，對東南沿海經濟性的港市興起特別是廣州、泉州之興衰，作扼要說明。又參劉炎明：〈明末城市經濟發展下的初期市民運動〉，《明代社會經濟史論集》(香港：崇文，1975)，第一集，頁191。又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參第四章，對東南地區城市興起有極佳之分析。

⁵ 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台北：學生書局，民55)，頁53。

⁶ Edward Thomas Williams, *China, Yesterday & Toda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23), p.140, "Seen from the top of a city wall the Chinese city, as a rule, does not present a very interesting appearance. The prospect is one of dark grey gabled roofs covering grey brick buildings. Here and there will be seen an open space overgrown with grass and weeds. Most houses are of one story, a few have two stories; fewer have three. The monotony of the view is broken only by the trees that rise above the garden walls, or by an occasional pagoda...."

⁷ 馬甘尼(Lord Macarney)著，秦仲蘇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香港：大華，1972)，頁304。馬甘尼之記述：「自離開通州後見的城市形式大都相似。」

⁸ 楊文貞公文集二，都城覽勝詩後，北京城，見陳夢龍等選編：《明經世文編》(香港：珠璣書店)一冊，卷16，頁126。

⁹ 林尹註釋：《周禮·今註今釋》(台北：商務，民61)，頁471。據〈考工記〉謂：「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百步)」；又陳正祥：〈北京的都市發展〉，《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七卷一期，頁49，陳氏認為上述周禮〈考工記〉之記錄為「我國古代都城營建的理想模型，唯中國著名都城皆不符合此一理想，至元大都始稍有近似。」

¹⁰ 沙學浚：《城市與似城聚落》(台北：正中，1974)，頁4, 75-76, 85-86, 94。以上各揭書皆有關於傳統中國城市的描述，沙氏並指出我國「城市」並稱，特具意義；「城」是指在政治

行政、軍事機能而言，城市多有城垣，加強保衛機能，尤具特色；而「市」則指商業機能，乃交通發展的結果，沙氏以地理學者的觀察，與史學家透過文獻記錄瞭解，得以互相印證。

- 11 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台北：文星，民53)，第97冊，考工典(一)，卷廿五。城市部引易經〈坎卦象傳〉：「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註：「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甚大」。又鄭樵《通志》(商務，萬有文庫本)卷41，〈都邑，第一邑序〉：「建邦設都，皆憑險阻，山川者，天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
- 12 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北京：商務，1959)，頁239-247。又《古今圖書集成》，第97冊，考工典(一)，第30卷，城池部，頁311，內有明朝修城記載，可知明代城之形制，《國朝典彙》，嘉靖廿一年七月時邊報日至，掌都察院毛伯溫等言，古者省城必有郭城以衛民，郭以衛城，太祖定鼎南京，既建內城復設羅城於外…」
- 13 何炳棣：〈北魏洛陽城郭規劃〉，《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台北：清華學報社出版，民54)，上冊，頁236。何氏以為「城區軸心原則乃由北魏洛陽確立而普遍應用的。」此中軸心原則，並於日後直接影響唐代長安之修建。
- 14 《中國建築簡史》(中國工業出版社，1963)，第一冊，中國古代建築，頁11-12；又中國科學院土木建築研究所、清華大學建築系合編《中國建築史》(北京：文物，1957)，頁2。兩書對我國傳統城市的佈局及其建築群分置的歷史、地域及技術特色作扼要的敘述；後書主要為傳統中國建築圖片之彙集。
- 15 加藤繁，同註12，頁248-249。
- 16 勞榦：《中國的社會與文學》(台北：文星書店，1964)，〈南方型的城市與北方型的城市〉，頁171。
- 17 程光裕：《中國歷史地圖》(台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社，民44)，一冊，參考唐代長安城坊圖內的東市、西市，可助瞭解。
- 18 加藤繁，同註12，頁261-269；並參同書之〈唐宋時代的市〉一文，頁278，301-303。
- 19 勞榦，同註16，頁170。
- 20 劉石吉：〈城郭市廛——城市的機能、特徵及其轉變〉，《中國文化新論——經濟篇》(台北：聯經，民71)，頁322-332。
- 21 Rhoads Murphey, "The Treaty Ports and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Mark Elvin and G. William Skinner eds., *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ld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7-71; 近日新近研究，可參張洪祥：《近代中國通商口岸與租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一書。
- 22 K.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London: Penguin Book Ltd., 1954), pp. 7-9.
- 23 R.H. Tawney,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pp. 13; 並參楊東平：《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東方，1994)，頁37-44。

【書刊評介】

黃仁宇教授新著兩種介紹

黃仁宇教授以《萬曆十五年》一書享譽學界，其後《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國大歷史》、《近代中國的出路》等均受到廣泛注意。他以八十高齡撰成《新時代的歷史觀——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出版社稱之為「黃仁宇思想體系的總結」，以他的「大歷史」觀點，「為中國人的出路提出一種可能的視野，一個新時代的歷史觀。」作者在〈導言〉中認為，「體」是組織結構，「用」乃是精神與效能的發揮，有了新體制之輪廓，才能決定發揚傳統精神之出路。他強調中國長期革命業已成功，他同意於張之洞的看法：既要「知本」，又要「知通」。可是在正反前後的程序上接受現實，先有現代化，才能發揮精神與效能，此即「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旨意所在。

〈導言〉以下各章，依次為〈中國需要大規模改造之由來〉、〈近代西方政治哲學與經濟思想之大勢所趨〉、〈中國現代史之輪廓〉、〈中國為用的緣由及應賦予的考慮〉、〈「用」必須因「體」而調節〉。作者說：「瞻前顧後我們方始瞭解中國需要全面大規模的重造，有幾百年堆砌著的原因，而藉這撼天動地的局面完成。……這改造的程序卻超出中國傳統歷史的規模。所以我提議就教於西方學術上的著作。」又認為「在體制上講，中國之現代化與西化區別至微。」〈結論〉強調「以歷史代替意識型態，也就是接收歷史的仲裁。」附錄〈擬「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答客問〉。黃仁宇的「西體中用論」究竟是「新時代的歷史觀」，抑或像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一樣，是總結一個時代的歷史觀，有待學界的討論。

黃教授的另一新著《關係千萬重》（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是一本隨筆，包括〈李約瑟給我的影響〉、〈大變局中讀歷史〉、〈內戰〉、〈東南亞的金融風暴〉、〈日本、Nippon, Japan〉等二十篇文章，悠悠然出入於歷史的邊緣和側後，為我們剖析人間世的種種因果關係。作者在〈自序〉中指出各篇無不涉及歷史的場面與層次，即是個人回憶與旅遊觀感也不沾上當今歷史變化的成份。又說：「讀者必須注意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前途將部分由周邊國家的出處決定，有如在二十世紀日本與美國的命運半由中國決定。」研究中國必須認識亞洲整個區域的發展，是黃仁宇教授構築其「中國大歷史」的另一要素。

【書刊評介】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簡介

王雙懷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人類認識自然、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經過及其規律的科學。本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的歷史地理學有了較大的發展，到80年代，已在國家的經濟建設中發揮了明顯的作用。為了進一步加強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教授在1984年創辦了《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是中國唯一的歷史地理學定期刊物。該刊以促進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為宗旨，從“有用于世”的角度出發，刊登海內外學者有關中國歷史地理的優秀論著。內容

包括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歷史自然地理、歷史政治地理、歷史經濟地理、歷史軍事地理、歷史文化地理、歷史城市地理、歷史交通地理、歷史民族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地理文獻研究以及歷史地理考察報告等等，涉及歷史地理學的方方面面。此外，還及時刊登國內外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各種信息。由於該具有學術性、實用性和科學性，因而受到學術界的關注。

史念海教授是《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的創辦者，也是該刊名副其實的主編。在他的倡導和組織下，該刊的作者隊伍不斷壯大。除顧頡綱、譚其驤、侯仁之等老一代歷史地理學家曾為該刊撰稿外，曾昭璇、陳橋驛、李學勤、李健超、葛劍雄、鄒逸麟、張修桂、于希賢、韓光輝、朱士光、辛德勇、王守春、鈕仲勛、司徒尚紀、阿蘭·貝克、妹尾達彥等知名學者經常給該刊撰稿。還有一大批專門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中青年學者如郭聲波、韓茂莉、吳宏岐、華林甫、吳松弟、龔勝生等積極向該刊投稿。因此，該刊的稿源十分豐富。對於編輯部審定擬用的稿件，史念海教授都要逐一審閱。所以該刊質量上乘，受到海外學者的一致好評。

該刊自創辦以來，已出版了50輯，發表重要學術論文700餘篇，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築波大學的有關學者都認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代表了當今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水平，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以往該刊發行渠道不暢，各地圖書館很少典藏，常常有人想看而看不到該刊所發表的文章。最近，該刊編輯部應廣大讀者的要求，出版了歷年《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的合訂本。把十幾年來陸續出版的每期《論叢》合訂起來，精裝成一套十冊。這套合訂本內容豐富，裝幀精美，便於閱讀，也便於保存，很受讀者歡迎。

【學術會議】

「林則徐、鴉片戰爭與香港」國際研討會紀要

香港歷史博物館、林則徐基金會、中國史學會合辦的「林則徐、鴉片戰爭與香港」國際研討會，1998年12月18日至19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演講廳舉行，與會者逾60人，發表論文47篇。研討會分為以下主題和組別：

(一)「林則徐對西知的探求」——共有兩節，第一節由趙令揚(香港大學中文系)主持，論文包括：

1. 凌青(林則徐基金會)〈向西方學習的先行者〉，
2. 楊國楨(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林則徐的海洋觀與香港〉，
3. 蕭致治(武漢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林則徐眼中的世界〉；

第二節由楊國楨主持，論文有：

4. 李志綱(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林則徐對西知的探求與基督教士對西知的傳播〉，
5. 林學忠(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林則徐與近代西方國際法之翻譯〉，
6. 戴學稷(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林則徐評編述論〉。

(二)「鴉片戰爭與人物」——由劉蜀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論文有：

7. 李鴻生(廣東省社會科學大學/廣東歷史學會)〈徐繼畲與鴉片戰爭〉，
8. 羅天佑、方駿(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論梁廷枏對鴉片戰爭的歷史分析〉，
9. 周新國(揚州大學)〈林則徐與魏源〉。

(三)「港澳與鴉片戰爭」——共有三節，第一節由蕭致治主持，論文有：

10. 霍啟昌(澳門大學)〈澳門與鴉片戰爭〉，

11. 鄧開頌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港澳史室) 〈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在澳門與英國之戰〉，
12. 陳煒恆 (澳門雜誌) 〈林則徐與澳門官廟〉；
第二節由丁新豹 (香港歷史博物館) 主持，包括：
13. 莊建平 (中國社科院近史所) 〈琦善·義律·穿鼻草約〉，
14. 劉蜀永 〈清朝官員對香港的認識和清政府對英佔領香港島的態度〉，
15. 林啟彥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林錦源 (香港歷史博物館) 〈論中英兩國政府處理林維喜事件的態度〉，
16. 王汝豐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 〈洪仁玕與香港〉；
第三節由林慶元 (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 主持，論文有：
17. 徐新 (澳門政府文化司署) 〈改寫歷史的一次機會 —— 辛丑風災與鴉片戰爭〉，
18. 鄭德華 (澳門大學中文系) 〈鴉片戰爭前的粵澳關係〉，
19. 譚志強 (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 〈葡治澳門在中英鴉片戰爭前後所扮演的角色〉。

(四)「廣州貿易」——由吳倫霓霞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主持，計有：

20. 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鴉片戰爭前廣州口岸對於外洋的商貿形制〉，
21. 白德 (Solomon Bard, 澳洲) 〈茶葉與鴉片〉
22. 鍾寶賢 (浸大歷史系) 〈東印度公司與廣州的鴉片貿易〉。

(五)「鴉片戰爭與海防」——共有兩節，第一節由霍啟昌主持，包括：

23. 周子峰 (浸大歷史系) 〈鴉片戰爭前夕之福建海防〉，
24. 莫稚 (香港考古學會) 〈虎門與鴉片戰爭〉，
25. 老冠祥 (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 〈林則徐與中國近代海防〉；
第二節由吳志華 (香港歷史博物館) 主持，論文有：
26. 蕭國健 (珠海書院中文系) 〈清代大鵬協右營之興廢〉，
27. 李金強 (浸大歷史系) 〈林則徐與海防建設〉，
28. 黃順力 (廈門大學歷史系) 〈傳統海防觀與林則徐海防思想爭議〉，
29. 馬幼垣 (香港嶺南學院中文系) 〈鴉片戰爭期間的侵華英艦〉。

(六)「鴉片貿易及中英對鴉片戰爭的觀點」——由冼玉儀 (港大亞洲研究中心) 主持，包括：

30. 施其樂 (Carl T. Smith, 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 〈阿美尼亞人與澳門和廣州鴉片貿易的錯綜關係〉，
31. 許舒 (James W. Hayes, 澳洲) 〈曾參戰的英國海、陸軍官對中國、中國人和鴉片戰爭的看法〉，
32. 朱益宜 (浸大歷史系) 〈從文化角度透視鴉片戰爭與中國的對外關係〉。

(七)「鴉片戰爭與文化出版」——由鄭德華主持，計有：

33. 蘇精 (佛光大學南華管理學院) 〈文本與意象：印刷出版在阿美士德號事件中的角色〉，
34. 李谷城 (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 〈鴉片戰爭前後的澳穗港報業〉，
35. 陳樹榮 (澳門日報) 〈論林則徐的《澳門新聞》〉。

(八)「鴉片戰爭與歷史教學」——由黃浩潮 (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 主持，包括：

36. 馮志明 (香港歷史博物館) 〈論歷史教學中的思維培養 —— 以林則徐、鴉片戰爭與香港個案為例〉，
37. 陳溢晃 (香港旅行家雜誌/華南研究會) 〈歷史教育基地 —— 虎門兩岸古炮台展望〉，
38. 李維安、葉國洪 (浸大教育系) 〈鴉片戰爭的教學問題〉。

(九)「林則徐與鴉片戰爭的反思」——共有三節，第一節由蕭國健主持，論文有：

39. 區家發 (香港考古學會) 〈我對鴉片戰爭的一些反思〉，
40. 葉國洪 〈論鴉片戰爭的歷史教訓〉，
41. 蔣大椿 (中國社科院近史所) 〈關於鴉片戰爭的評價問題〉；
第二節由來新夏 (南開大學地方文獻研究室) 主持，包括：
42. 黃宇和 (澳洲悉尼大學歷史系) 〈對林則徐與葉名琛的反思〉，

43. 周佳榮 (浸大歷史系) 〈鴉片戰爭對東南亞的影響及其意義〉，
44. 林慶元 (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 〈林則徐、鴉片戰爭評價中的幾個問題〉；
第三節由周佳榮主持，計有：
45. 林子東 (福建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林則徐研究的當今價值〉，
46. 郝貴遠 (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 〈林則徐禁煙和中國政府禁毒〉，
47. 來新夏 〈林則徐的禁煙思想〉。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史學新聞】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活動簡報

第八屆清華暑假實習班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課程歷史專業學生25人，連同中國研究課程經濟、地理、社會專業共100人，於1998年6月6日至7月8日間，在北京清華大學參與暑假實習班。清華大學歷史系高敦復教授擔任專業指導，浸會大學歷史系的隨團教師為黃文江博士。

除普通話教學外，本屆暑期班的「當代中國講座」包括兩部分：全體大型講座有四次，分別由鄔滄萍 (人民大學教授) 講〈中國人口發展趨勢及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林泰 (清華大學教授) 講〈中國的政治體制及其改革〉、丁寧寧 (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員) 講〈國有企業的改革與出路〉、王振民 (清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講〈內地與香港法律制度比較〉，另有陳建明 (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講〈新詞新語〉；歷史專業講座，則有清華大學教授朱育和講〈近代中國對外開放的歷程〉、蔡樂蘇講〈鄧小平理論的基本框架〉、秦暉講〈改革時代農民問題的變遷〉。

本屆暑期班安排了全體同學參觀長城、明十三陵、航空博物館、蘆溝橋和周口店等名勝古蹟，觀看天安門升旗儀式及參觀人民大會堂香港廳和澳門廳；歷史專業同學還訪問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及第一歷史檔案館。

開辦「中國醫學史」科目

香港浸會大學於1998年9月起開辦中國醫藥學位課程，是香港高等院校的創舉。歷史系配合校方的需要，同時開辦「中國醫學史」一科，作為該課程一年級學生的必修科目之一，由周佳榮博士、林啟彥博士、李金強博士合教。

中國醫學史共有八講：第一講為〈導論：中國醫學史的一些問題〉；第二講為〈上古的醫學：先秦時期〉；第三至五講為〈中古的醫學〉，包括漢至魏晉時期、隋唐時期、宋元時期；第六講為〈近世的醫學：明清時期〉；第七講為〈近世以來醫學的發展〉，第八講為〈總結：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醫學〉。

參觀「中國科技文物展」

香港臨時市政局、中國歷史博物館聯合主辦的「中國科技文物展——天工開物」，由1998年9月29日至1999年1月3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新館舉行。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師及一年級學生共80人，於1998年10月22日參觀了該展覽，首由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博士致詞及介紹，另有專人在會場上為參觀者講解。這個展覽會匯萃了從國內多所博物館徵集而來的多項珍貴文物，分為天文、造紙、印刷術、指南針、火藥、農業、紡織、陶瓷、銅鐵冶鑄及機械製造等十個專題展出，藉此介紹中國過去在科技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貢獻。二百五十多件展品中，包括有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紙地圖、銅壺滴漏、記里鼓車、指南車，以及張衡的地動儀等巧奪天工的展品。展場並安排有傳統紡織術及雕版印刷術示範，既有教育性，也饒有趣味。

「近代中國海防」學術週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會1998-99年度學術週於1998年11月16日舉行開幕典禮，主題是「近代中國海防」。16日至20日間，由香港歷史博物館借出「靖海澄疆」展板多塊，在善衡校園平台展覽；另有學術講座於24日舉行，邀請嶺南學院中文系馬幼垣教授主講，題目是〈海軍史的研究範圍、資料和方法、以及研究須具備的專門知識〉。這是繼歷史系於本年6月間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嶺南學院中文系、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合辦「近代中國海防國際研討會」及「香港海防博物館藏品展」以來，另一次有關近代中國海防史的學術活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週年國際學術會議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學位課程定於1999年6月8日至10日舉辦「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週年：機遇與挑戰」國際學術會議，研討主題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地理及環境的回顧與前瞻等。歷史系為中研課程合辦單位之一，亦參與這個研討會的籌備工作，預計屆時將有多位來自中國內地、本港和海外的專家學者，提交及發表有關歷史學範疇的論文。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史學新聞】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活動簡報

香港史研究講座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與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合辦的「香港史研究講座」，於1999年1月16日舉行。講座由李培德(港大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主持，包括：劉蜀永(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講〈香港史研究的幾個問題〉，張俊義(社科院近史所助理研究員)講〈香港經濟史研究計劃和資料收集〉。

歷史文化考察系列講座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於1999年初舉辦了一連串有關歷史文化考察的講座和活動。講座方面，1月23日由鄭德華(澳門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主講〈歷史考察的方法〉，2月6日由戴溫明(香港中文大學建築系模型製作室技術員)主講〈古蹟模型的製作方法〉，同日並有題為〈文化考

察錄像製作技巧〉的講座。此外，又於1月30日舉行「歷史檔案大搜索——參觀香港歷史檔案處」。

中國文化專題講座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與元朗公民教育委員會、元朗區中學校長於1999年初合辦「中國文化專題講座」，共有三次：第一場由張世平（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中醫部助理教授）講〈中醫藥與中國文化〉，1月27日在妙法寺陳呂重德紀念中學舉行；第二場由陳方正（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講〈中國科學與傳統文化〉，1月29日在裘錦秋中學舉行；第三場由鄧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主任）講〈無文字在香港——重新認識香港古文化〉，2月5日在元朗商會中學舉行。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Research Notes】

The Definition of "Modern China": On the Question of "When Did It Begin?"

Yik-yi Chu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5), a modern society is an industrial society. Between the six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the western world entered the modern age. England, the Netherlands, northern France and northern Germany were the earliest examples of modern states.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itnessed their rise. The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installed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brought forth significa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hus, modern states experienced the forces of modernization. Related topics were material improvements, mechanization, the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population growth, individu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However, the *Encyclopedia* continues to reiterate an outdated theme. It believes that the western experie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was the model for worl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at modernization meant westernization.

As indicated above, to be modern is to become industrialized and modernized. Nevertheless, historian Jonathan D. Spence has another definition of modern states. According to him, a modern state is "to be one that is both integrated and receptive, fairly sure of its own identity yet able to join others on equal terms in the quest for new markets, new technologies, new ideas."¹ With this in mind, he believes that China is not really a modern state even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o, how should we define "modern China"? In term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which the *Encyclopedia* highlights) and the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community (which Spence mentions), China was not a modern state until it opened to the world in 1978. Thus, to study "modern China" is to understand a certain period of its history, which is most-directly related to its contemporary situation. In other words, my definition of "modern China" rests on the criterion of time. As Paul A. Cohen states,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is the study of "the recent Chinese past."²

The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e Problem of Studying Modern China

The definitions, of the *Encyclopedia* and of Spence, tell the biases of Sinologists in their study of modern China. They had shaped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for many years. I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Cohen discusses the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hina, and criticizes the ethnocentric distortion of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For example, the modernization approach asks why China failed to experience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As Cohen says, the basic assumptions are that the west is the norm, and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abnormal aspects of China, which deserve close attention. This is similar to the *Encyclopedia's* definition, which equates modernization with westernization.

Cohen does not like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into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periods. The dichotomy suggests that traditional China was backward and undeveloped, and that the country became modern only after its contact with the west. This further relates to the prejudice that Chinese society had been stagnant, and that it needed an external shock to set it in motion again. According to Cohen, the modernization approach assumes "first, that China could be jolted from its somnolent condition only by means of a major external shock; second, that the modern West, and only the modern West, was capable of administering such a shock; and third, that this process, already in motion, would end in the making over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Western image."³ Sinologists understood China only from their western perspective. Their outlook was parochial as they only focused on aspects of Chinese history, which had direct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A noticeable example was the study of treaty ports. They painted an oversimplified picture of China, that its history before the western intrusion was unchanging, insignificant, and did not deserve serious attention. Having failed to realize that China had been going through continuou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they claimed that "traditional China" had been under inertia, and that westerners came to wake the country.

This approach dictate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for Sinologists: why China had not undergone the same modernization process like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Here, Cohen reminds us of an early work. In *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1960, 1965), written by John K. Fairbank, Edwin O. Reischauer and Albert M. Craig, China was regarded as relatively unchanging. The authors believed that China had only experienced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without any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until the contact with the west.⁴ They focused on "the more stable and abiding features of Chinese culture," neglecting the existence of disruptive forces, and had their own assumptions of what changes were good and what were not.⁵ Not only did they believe that western intrusion accelerated the decline of the Chinese state, they argued that "the West *alone* initiated the breakdown and remained its principal (if not exclusive) causal agent."⁶

I would say that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arted around 1600. Here, I emphasize a number of themes. Firstly, to understand China and the west is not to study two opposites, but to recognize their *relative* differences. I do not emplo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world community" definitions for modern China because they were impositions of western images or standards. They lead us to the fallacy that China should adopt the western way. However, I think they can serve as criteria for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Secondly, we should study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 itself. China had not been static, but had always witnessed changes and growth. Even before the western encroachment, China had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population growth,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rchant class. All these happened *without*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ich was usually a precipitating factor in the west.

Thirdly, China had been facing the problem of how to maintain the power balance between the center and the provinces. In the 1910s and 1920s, China experienced important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s. It was an era of diversification and experiments, but soon to be replaced by the rule of the Guomindang, and later of the Communists. Today, with the demise of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Chinese people have a chance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 However, how to continue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and to avoid the possible dangers of chaos and confusion? How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of decentralization? These were the problems which confronted the Chinese throughout their history.

Fourthly, the starting point for modern China was around 1600. China then experienced a population growth and a corresponding expansion in production, trade, and the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As John King Fairbank notes: "From 1741 to the outbreak of the great Taiping rebellion in 1851 the annual figures rose steadily and spectacularly, beginning with 143 million and ending with 432 million. If we accept these totals, we are confronted with a situation in which the Chinese population doubled in the 50 years from 1790 to 1840."² The huge population had exerted enormous pressure on the country, and led to the decline of the Qing dynasty even before the western intrusion. The year 1600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blems that China would soon face. The Chinese problems began at home, with domestic rebellions, and not with foreign invasion.

¹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0), p. xx.

²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³ *Ibid.*, p. 67.

⁴ *Ibid.*, pp. 64-65.

⁵ *Ibid.*, p. 65.

⁶ *Ibid.*, p. 77 (italics his).

⁷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68.

【Book News】

Clara Wing-chung Ho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The Qing Period, 1644-1911*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8;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387pp. +xxxvi. [Editors-in-chief: Lily Xiao Hong Lee and A. D. Stefanowska; The Qing Period Editor: Clara Wing-chung Ho]

This major new reference is the product of years of research,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by a team of over 80 scholars based in Hong Kong, China, Taiwan, Japan, Australia, Canada, U.S.A. and the Netherlands.

Compiled from a wide array of original sources, these detailed biographies present the lives, work, and significance of nearly 200 Chinese women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areas of interest ---- including literature, painting, drama, embroidery, pottery, politics, science, religion, education, journalism, healing, cuisine, and music.

Each entry is substantive and reflects careful research and the diligent gathering and synthesizing of the known facts of each subject's life. This book is the first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in any Western language devoted solely to Chinese women.

Dr. Clara Wing-chung Ho is now associate professor in History at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er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historical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wome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ent of children's education in imperial China.

【Book News】

Ricardo King Sang Mak, *The Future of the Non-Western World in the Social Sciences of 19th Century England*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h, 1999). 236pp.

This book investigates what 19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ists, social evolutionists, anthropologists and new liberals, on whom modern development theorists draw heavily, and whom modern underdevelopment theorists attack mercilessly, had to say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non-Western World. Principally this book examines how these great minds of last century addressed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Can non-Western nations since the 18th century? - Ar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Western nations and non-Western nations obstacles or moving forc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tter? - Can the experience of Western nations serve as a guideline by means of which the non-Western nations can escape from stagnation? This book concludes that the 19th century social scientists' position laid closer to the underdevelopment theorists than to the development theorists.

Ricardo King Sang Mak, Ph.D. (Regensburg), MA, BA H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sistant Professor in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Majo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Sino-German relatio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Western thoughts to modern China.
